

今年正值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、逝世90周年。近日，“力之美——鲁迅与版画”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展出。本次展览既是对鲁迅美术思想梳理，也是以刀锋与木纹之间的“力之美”来缅怀这位毕生寻求“改造社会、唤醒民众”良药的精神导师。让我们回溯鲁迅的木刻版画收藏历程，分析他是如何构建木刻版画传播网络，使木刻版画成为“连接知识阶层与底层民众的桥梁”。



▲黄永玉木刻作品《鲁迅和木刻青年》

萌芽：

童年的影写与六千张拓片

艺术的萌芽，往往在幼年时便破土。鲁迅接触木刻，并非成年之后的事。周建人在回忆兄长的童年时有这样一段话：“鲁迅幼年时对民间艺术很爱好。他爱画画，画的多是古装人物，是从各种书上影画出来的，后来装订成本子……由于爱画画，他把过年的时候大人给他的压岁钱，攒起来买画谱。当然，这些书并不是怎么好的版本，无非是木刻或石印的线装本，装订得又不好，容易脱线。鲁迅常常改换封面，重新装订。封面用一种栗壳色的纸来做……翻看时很仔细，先看手指上有没有墨迹或是否脏了。”周作人也如是回忆。

“这里边最记得清楚的是马镜江的两卷《诗中画》，他描写诗词中的景物，是山水画而带点小人物的，描起来要难得多了。但是鲁迅却耐心地全部写完，照样订成两册，那时看过的印象觉得与原本所差无几，只是墨描与印刷的不同罢了。”周作人也如是回忆。

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李新宇介绍，被鲁迅如此影写的，还有王冶梅的画谱《三十六赏心乐事》、王磐的《野菜谱》等。画画、读小说、影写画谱、树谱、野菜谱，这些事都很费时间和精力，于科场考试无补，却在日后成为鲁迅热衷于收藏画册、精于封面设计与书籍装帧的根源。

多年后，当鲁迅在北平的寓所里整理那些泛黄的拓片时，童年的影写经历似乎在冥冥中指引着他。他认为“木刻是中国固有的，而久被埋没在地下了”。从1914年开始，鲁迅大量收集、购买石刻拓片，特别是六朝时期的碑拓，进行保护与研究。他将碑拓按类别、朝代进行详细分类、整理，并且参考了许多书籍，仔细校对每一个字，记下前人的错漏之处。这些积累最终汇成《六朝墓志目录》《六朝造像目录》《俟堂专文杂集》等著述。

对汉碑上的纹样，鲁迅十分重视，最后却因印刷费用的问题没能整理成册。1926年，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，举办了一次小型拓片展。1936年，他也有编著南阳汉画像拓片集的愿望，却不幸病逝，这一夙愿最终未能完成。

据统计，鲁迅收藏的中国历代石刻拓片约有六千张，涵盖各类以石刻形式保留下来的图像与文字，其中不乏石碣、墓志、造像、碑刻甚至砖瓦文。这些工作的背后是鲁迅对民间美术的尊重。

正是这样痴迷般的深扎、沉潜，让鲁迅站在中西、古今的十字路口，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采用外国的良规，加以发挥，择取中国的遗产，融合新机。”

鲁迅的金石收藏与研究，间接影响了新兴版画的发展，如《曹全碑》、射阳石门画像等，成为版画技法的重要灵感源泉。其中的汉画像石拓片与碑刻篆隶，转化为木刻的线条力度与构图灵感。当时的青年版画家李桦的《怒吼吧，中国》从阳刻线条中汲取力量，通过解剖式刻画塑造被缚青年的爆发力，展现“斧刃般的锋利精神”。可以说，汉画像的线条力度与空间布局、碑拓的篆隶笔意，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当时的版画艺术，特别是版画文字的视觉设计。

1934年，鲁迅与郑振铎共同委托荣宝斋重刻《十竹斋笺谱》，在保留饾版套色技术的同时，改良装帧设计，采用瓷青纸书衣与线装形式，此举既保护了传统工艺，也为现代版画提供了技艺借鉴与支撑。他在《〈十竹斋笺谱〉重刊说明》一文中强调：“此谱原刻固已珍罕，但木刻技术之佳，实为今日所稀。”重刻不仅保留明代套色印刷的精湛工艺，更通过设计改良，使传统笺纸艺术焕发新的生机，为现代版画提供审美范式。



▲山东汉画像石《建鼓乐舞》拓片。鲁迅在给李桦的信中曾写到：“惟汉代石刻，气魄深沉雄大，唐人线画，流动如生，倘取入木刻，或可另辟一境界也。”



▲阿勒惠支作品《德国的孩子们》



▲葛饰北斋作品《富狱三十六种景东京浅草本愿寺》

深爱：

从浮世绘到珂勒惠支的跨越

鲁迅对美术的热爱从未停止。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着每一次购书、每一次收藏。海外的画册、美术论著被他一本本买回家，堆满了书架。

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时，鲁迅第一次接触到浮世绘。那些色彩鲜艳、构图独特的画作深深吸引了他。回国后，他继续收集浮世绘作品。据统计，他共收藏了浮世绘书籍17种33册，作品42幅，其中包括喜多川歌麿、葛饰北斋等大师的作品。

浮世绘之后，鲁迅通过外文书籍接触到了欧洲版画。高更《诺阿·诺阿》中的插图，是他最早接触到的欧洲版画之一。那些充满原始力量的作品让他深受震撼。他开始大量购买木刻书籍，筛选其中的作品编入期刊、画报，或印刷出版。

在德国版画中，格罗斯的《席勒剧本（强盗）插图》引起了鲁迅的注意，锐角与曲线的动态博弈，暴力美学的空间叙事，这些都与他内心对封建专制的反抗产生了共鸣。

但真正让鲁迅震撼的，是珂勒惠支的作品，尤其是那些对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深刻描绘，每一幅作品都像一把利刃，直刺人心。1931年，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特别是柔石，鲁迅将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画《牺牲》发表在《北斗》杂志上，这是他在向中国青年介绍的珂勒惠支的第一幅作品。1936年7月底，鲁迅编印出版了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集》，内收珂勒惠支石版、铜版作品共计21幅。鲁迅亲自设计了该画册的封面与版式，并亲笔题写了书名，序目中还特地为每幅作品书写了简短的介绍。为了这本画册的出版，鲁迅在七月间不顾自己重病，顶着暑热与夫人“在地席上一页一页地排次序夹层”，画报也“成为病中的纪念出品了”。此书也是鲁迅生前最后编印出版的一本画册，由此不难窥见珂勒惠支在其心中的分量。

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，苏联版画也进入了鲁迅的视野。冈察洛夫的《土敏土》插图以工业复兴象征社会变革，法沃尔斯基的《列宁像》则以纪念碑式构图塑造革命先驱。鲁迅仔细比较这些作品，翻译《艺术论》《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》等著述，思考着外国版画对中国木刻青年的启示。

透过包括德国版画在内的那些来自异域的刀刻画面，鲁迅凝视和拷问着人的生命存在。这其中既有之于群体的生命存在的深深忧患，又有对个体普通人的生命存在的真切关注。在他那双冷峻、深邃的眼睛里，那些能够展现出人的生命力量的版画，即是大美之作，当看作“文艺上的遗产”。

唤醒：

从朝花社到木刻讲习会的实践

鲁迅的版画运动绝非停留在文章的学术探讨层面，而是通过组织化行动构建起覆盖全国的艺术网络，推动木刻画成为“有意义的形式”。

1928年的上海，鲁迅与好友创立了朝花社。他们出版《艺苑朝华》五辑，将国外的版画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，举办木刻讲习班，培养黄新波、曹白等第一代新兴木刻家。他亲自编写讲义，如《木刻创作法》，强调“木刻之道，贵在‘刻’字”，即通过手工劳作实现艺术与现实的对峙。这些机构与活动，将版画从“个人创作”升级为“集体运动”。

1931年，鲁迅创办中国首个木刻讲习班，即“木刻讲习会”，邀请日本美术教师内山嘉吉授课，培养出江丰、陈烟桥等骨干。他强调“木刻根底在素描”，批评早期作品“人物结构不准确”，推动青年从观察现实入手。

胡一川的《到前线去》以大块黑白与夸张动态，突破技法局限直抒抗战激情，印证鲁迅“放刀直干”的创作理论。通过筹办木刻讲习会，鲁迅的个人收藏似乎已潜移默化地转化为“公共教育资源”。他特意选择法捷耶夫等左翼作家的版画教材，使技法传授与先进思想传播同步进行。这种艺术理念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，培养出的李桦、胡一川等新一代艺术家，也成为艺术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。

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，这在鲁迅之前的时代从未有过。在木刻青年之间，这样的倾向尤为明显。饥荒、苦难的人们成为画面的主人公。因此，鲁迅写道：“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，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，但决不是葬中枯骨，换了新装，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支铁笔和几块木板，便能发展得如此蓬勃。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。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。”

什么是“现代社会的魂魄”？20世纪30年代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，正是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时。构成“现代社会的魂魄”的，应该是救亡图存、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。面对人民的苦难、斗争，木刻家们用饱含感情的作品去记录、歌颂。

在新兴版画的发展中，劳动人民成了画面的主人公，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。中国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正是由新兴版画开拓的。当然艺术并不等于政治，鲁迅早就告诫：“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，是不错的，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。它之所以是工具，就因为它艺术的缘故。斧是木匠的工具，但也要它锋利，如果不锋利，则斧形虽存，即非工具，但有人仍称之为斧，看作工具，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，不知作工之故。”

1936年10月8日，鲁迅拖着病体，参加了第二回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。青年摄影家沙飞举起相机，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：鲁迅身着深色长衫，手持烟卷，目光灼灼地看着墙上的作品。《流民》《饥民》……那些揭露社会苦难的作品在他身后静静悬挂。

鲁迅特意在赖少其的《民族的呼声》前驻足良久，转身对身边的陈烟桥、黄新波、曹白等青年艺术家说：“这幅最有战斗力。”他又指着《罐梨》说：“这幅我也要收藏。”这场展览从广州出发，经过杭州、南通、上海等十余座城市。每到一处，都有大批观众前来参观。

当然，“刻”既是木刻的技法，更是鲁迅对艺术家的期许——既要“刻”入社会现实，又要“刻”破旧文化的桎梏。“鲁迅所处的时代面临着新文化与旧传统、继承与创新等种种思想、文化层面的争执与矛盾，鲁迅用其版画行动表达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索。”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蔡志忠认为，“鲁迅对于版面的理解也提示着当下的创作者，应当抛开狭隘的古与今、东与西的束缚，积极吸收一切具有鲜活性的、优秀的文化养分，创作出更美好的面向大众的版画作品。”

展厅里，参观者们静静地走过一件件展品，有人在汉画像石拓片前驻足，有人在珂勒惠支的作品前沉思，有人在木刻讲习会的老照片前久久凝视。那些刀痕与木纹仿佛在诉说着一个跨越世纪的故事——关于一个爱画的孩子、收藏拓片的学者、培养青年的导师，用艺术唤醒民众的战士。这些故事，在时光中静静流淌，历久弥新。



▲刘观木刻作品《小贩》



▲李桦木刻作品《怒吼吧，中国》

文化观察

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：真功夫难掩“拼盘”之感

□ 本报记者 师文静

截至目前，2026年上映的国产院线电影中，豆瓣评分超过7.4分的仅有《我，许可》《夜王》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四部电影。其中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被不少观众视为“隐藏佳作”，“警匪片+东北元素”的设定独具特色，也代表着国产动作片在实打实功夫领域的坚守。不过，难以否认的是，影片在叙事逻辑、风格统一、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。

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比前两部更成熟，对国产动作喜剧类型片的边界作了有效的探索与突破，在该系列中最具代表性。

影片中，谢苗饰演的东北刑警李红旗，被丈母娘催着前往海南办婚礼，刚落地便得知飞机邻座的女孩听听说遭人拐卖。为了解救被拐儿童，他与当地警方联手，深入虎穴搜集线索，并与贩卖儿童的秦叶蓉团伙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。

电影前半部分充满东北喜剧风格。催着女婿办婚礼的丈母娘，操持的竟然是丧葬生意。急性子“霸总”丈母娘身边，围绕的是《乡村爱情故事》演员组成的“殡葬天团”，婚礼策划会中，开口聊的是谁的喇叭吹得好，“草地婚礼”口误成“草皮葬礼”……用办白事的流程操办婚礼，浓郁的东北喜剧味儿扑面而来。丈母娘还要带着李红旗在台球厅搜集线索，并骑小摩托参与抓人贩子等重头戏。“东北亲友团”把东北式的人际交往模式与幽默感移植到海岛，试图贡献大量生活化的笑点。

婚礼筹备与警察打拐两条线并行，李红旗一边应付岳母的各种要求，一边办案，生活的琐碎与警匪战的紧张形成强烈对比，轻松的笑料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警匪故事的沉重感，多了一些温暖与烟火气。

在前两部影片中，李红旗的警察形象就立住了，且深受观众喜爱。他休戚必遇大案，穷追不舍，身上有一种宿命般的使命感。工资低却拼命抓犯罪分子，被拉拢或误解时总说：“我就是个小警察，只会抓贼。”平凡中透着不平凡的追求。他业务能力强大，执法有气势，战斗力爆表，不改初衷，有股“轴”劲。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中，李红旗更生活化：晕机、顺从拍婚纱照、被家务困扰，尽显凡人烟火气；但对小女孩听听说充满责任感，办案时又成为武艺超群的硬汉，充满朴素正义感。他在平凡与勇猛间自由切换。



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电影海报

电影中另一个看点是多场打戏拳拳到肉，充满视觉冲击。李红旗与警察办案，从台球厅追踪人贩子至秦叶蓉和“卖鱼佬”的老巢，展开殊死搏斗。“台球厅群像打戏”“废楼巴西柔术对决”等精彩打戏中，李红旗以擒拿、摔跤制敌，呈现“狠与巧”的中式动作美学。在大量依赖特效、剪辑和替身的当代动作片中，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以“真打、真摔、真疼”的实拍美学赢得了观众的好口碑。

然而，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在接受院线观众更为严苛的审视时，也暴露出创作上的一些短板。“警匪片+东北元素”的组合，增加了影片“笑果”的同时，也让影片前后风格比较割裂。正如网友所说，影片前半段“嘎嘎好笑”，中段则突兀转入阴森压抑的悬疑调性，最后又彻底回归硬核动作模式。整体来看，这部电影更像是东北喜剧、悬疑、动作片、现实等元素的拼盘。东北味儿半路戛然而止，且东北幽默也没有与海南地域属性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；悬疑追凶全靠“巧合”，动作戏虽然好看，但似乎与当代警察办案的现实脱节。

影片风格定位混乱，而“打拐”这一社会现实议题与喜剧元素的碰撞，也产生了不小的违和感。这让观众无法共情儿童被拐的悲剧，也无法真正享受喜剧的乐趣。

此外，影片在一些人物的塑造上也值得探讨。比如人贩子秦叶蓉这个人物，创作者似乎想在其身上加入更多戏份，塑造一个因丧女而精神崩溃的母亲形象，让这个人物更具复杂性和悲剧性，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。人物的铺垫过少，后期转变也很突兀。另一反派角色“卖鱼佬”，也没有更多人物身份交代，其犯罪的深层动机被省略，这个人物更像是游戏中的NPC，目的是与男主角演一场打戏。

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整体上仍停留在“网大”的舒适区，没有为每一次打斗、每一个人物设计足够的叙事动机和情感铺垫。同时，在风格探索上，影片应该有一个深耕的主基调，再叠加各类附属元素，不要在风格之间反复横跳。

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中，袁和平、吴京、李连杰等功夫名家还在坚守传统武侠。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中，武打童星出身的谢苗更是零替身展示各种格斗技巧，他和一众创作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，维系着当代功夫片的火种与尊严。然而作为院线影片，《东北警察故事3》票房只有2200多万元，并没有掀起多少浪花。这说明，日渐没落的真功夫电影，要想把观众拉回影院，还需要解决主题深化、挖掘更多观影情绪价值等问题。



刀锋铸就「力之美」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实习生 金霖